

燕赵学术

二〇一三年秋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 语言学

◆ 古代文学

◆ 文献学

◆ 地域文化

◆ 现当代文学

◆ 文艺学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教育与教学

◆ 学术名家

◆ 研究生论坛

◆ 书序与书评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燕赵学术



二〇一三年秋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赵学术·2013 年秋之卷 /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80682-876-2

I. ①燕… II. ①河…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572 号

YAN-ZHAO XUESHU

燕赵学术 2013 年秋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特约编辑 于峻嵘 孙秀昌

责任编辑 李婷玉 唐功敏

初审 李婷玉 唐功敏

复审 帅初阳

终审 杨宗义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封面题字 郭预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刷 石家庄名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5

书号 ISBN 978-7-80682-876-2

定价 28.00元

《燕赵学术》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苏宝荣 王长华

主任委员：阎福玲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峻嵘 史锦秀 孙秀昌 吴继章

武建宇 郑振峰 姜文振 胡景敏

郭宝亮 崔志远 霍现俊

主 编：崔志远(常务) 吴继章

目录

语言学

- 1 李开章、黄文字学说的新开拓
——学习潘重规先生的相关论著
- 10 宋文辉 吕伟 构式语法与历史语法和语法化札记
- 20 李蕾 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
——零度偏离理论、显性潜性理论述评

古代文学

- 27 吴在庆 韩偓疑伪诗文考辨
- 34 阎福玲 论唐代边塞诗的意象运用
- 43 吴光正 王一帆 全真七子的宗教试炼及其文学再现
——以道情、戏曲、小说为中心
- 53 曾智安 傅玄《晋鼓吹歌曲二十二篇》的形态新变及其文学影响
- 59 刘万川 曹向华 《香奁集》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

文献学

- 66 王澍 论尾兴
- 71 王俊才 李智伟 《荀子》“綦谿利跂”所示陈仲思思想之新解
- 75 王京州 先唐论说文补遗
- 82 杜志勇 《汉书·艺文志》研究述略

地域文化

- 86 崔志远 论河北文化精神

现当代文学

- 97 陈超 我看近年来的中国诗歌
——在第二届亚洲诗歌节上的主题发言

- 111 安文军 语丝同人关于“语丝文体”讨论的历史还原

文艺学

- 123 邢建昌 李娜 人类本体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本质论的一个维度
133 周祖谦 张连武 王国维“境界说”视域下的“真景物”与“真感情”臆解
142 朱国华 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与中国语境(下)
152 卡尔·雅斯贝斯著 孙秀昌译 作为哲学家的达·芬奇(上)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162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社会发展三题
171 黎跃进 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译介与接受
176 史锦秀 中古文化关系考

教育与教学

- 184 李智 黄福元 中学语文教材语义与传意研究
——以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注释为例

学术名家

- 190 马云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郭志刚先生的学术道路

研究生论坛

- 201 赵俊荣 辛格儿童故事中的“傻瓜”形象
208 姜姝 《肇论》与庄佛互释研究三题
215 王瑞敏 《英汉双解词典》单义形容词释义类型研究

书序与书评

- 223 曾庆江 传播学视野下台港澳文学的创新性研究
——评赵小琪等《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

YAN-ZHAO ACADEMIC RESEARCH

Autumn 2013

Major Articles

The New Exploration of Zhang Taiyan and Huang Kan's Philology

——Learning Mr. Pan Chonggui's Works Li Kai (1)

Reading Notes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Historical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 Song Wenhui Lü Wei (10)

On Language Essence——The Reviews o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With Zero Degree &

Deviation Theory and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Theory Li Lei (20)

Textual Research on Han Wo's Apocrypha Wu Zaiqing (27)

On Image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of Tang Dynasty Yan Fuling (34)

Religious Influence and Reproduction in Literature of the Seven in Quan Zhen Taoism——

Dao qing, Drama and Novel-Oriented Wu Guangzheng Wang Yifan (43)

The Impact and New Changes of Morphology Of Fu Xuan's 22 *Guchui Ballads*

..... Zeng Zhi'an (53)

Xianglian Collection's spreading and acceptance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 Liu Wanchuan Cao Xianghua (59)

On Wei Xing Wang Shu (66)

New interpretation on Chen zhong's thought shown in the "Qi Xi Li Qi"(嵇谿利歧) in *Xun Zi*

..... Wang Juncai Li Zhiwei (71)

An Addendum to Essais that before Tang Dynasty Wang Jingzhou (75)

A Brief Comment on *Record of Art and Cultur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 Du Zhiyong (82)

On Cultural Spirit of Hebei Province Cui Zhiyuan (86)

On Chinese Poetry in Recent Years——Keynote Speech in the Second Asia Poetry Festival	Chen Chao (97)
Historical Reproduction of Discussion on “Yu Si Style”	An Wenjun (111)
Human Ontology: A Dimension of Literary Essence in the 1980s	
..... Xing Jianchang Li Na (123)	
Hypotheses on “Real Scenery” and “True Fee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g Guowei’ s Realm Theory	Zhou Zuqian Zhang Lianwu (133)
Adorno’ s Popular Culture Theory and Chinese Context (II).....	Zhu Guohua (142)
Da Vinci as a Philosopher (I).....	
..... Written by Karl Jaspers, Translated by Sun Xiuchang (152)	
Three Topics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Western Social Development.....	Liu Jianjun (162)
Zheng Zhenduo on Tagore’ s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Li Yuejin (171)
On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yrgyzstan	Shi Jinxiu (176)
On Semantics and Meaning Transference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Junior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Take Annotation of PEP Textbooks in Junior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 for Example	Li Zhi Huang Fuyuan (184)
“The pine looks fresher after rain, The water trickles along with mountain” ——Guo Zhigang’ s Academic Road	Ma Yun (190)

章、黄文字学说的新开拓 ——学习潘重规先生的相关论著

李 开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 氹仔 000853)

摘 要:潘著视文字为“自己民族全体的心灵结晶”,一宗章、黄视汉字为民族的“种性”说、汉字特质“形声双衍注音字”说走进了现代文字学领域。文字学纵向分三个时期,可与唐兰文字学分期做比较。潘认为《说文》是研究经籍古文的“最可靠的材料”,将《说文》古文和未载入的古文与甲、金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甲骨文字的研究,潘以董作宾“四阶段”说,即字句的考释、篇章的通读、分期的整理、分派的叙述为研究法,研究目标“唯甲文以考史”。关于文字学的应用,潘氏在研究实践和操作实践上都可圈可点,特别是潘氏《说文》借体说的清晰表述,应是释读古文字的方法。

关键词:潘重规;章黄学派;文字学原论;《说文》古文和古文字;实践和应用

潘重规先生(1908-2-14 — 2003-4-24)自号石禅,曾师事章炳麟(1869 — 1936)、黄侃(1886 — 1935),是章黄学派的学术传承者。1926年秋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改中央大学)中文系,^①1930年秋毕业。大学毕业后去武汉湖北高级中学教书,1932年夏奉师命回中央大学任教,同年,汪东为潘著《荀子集传订补》撰序称:“潘生石禅,从季刚受学,重其才,以女(念容)妻之。”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曾执教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并获法国学术院、科学院重奖殊荣;亦曾先后游学于新加坡、英国、苏联,经历了与内地同时代学者不同的生涯。潘重规的主要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以及由此出发而指向、推衍至经学、文学方面,亦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张之洞语),

这本身就反映了潘氏治学的一般信条和科学思路。潘氏语言文字学的论著主要有《中国文字学》等35种。^②这35种中,直接与文字有关的有17种,其余的为音韵和训诂,也都离不开文字,可知文字学为潘氏学术的中心之一。

一、文字学原论

《中国文字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著作,其时内地正处于文化荒漠时期,无书可比。《中国文字学》可分两大块:一般原理和古文字专论,另附东汉《说文》研究和周宣王太史籀《史籀篇》考辨,可看作文字学应用研究举例。原理的阐述方面,见地深邃。关于“中国文字学名义”,“名义”二字,与中国古代正名逻辑、名理逻辑、古代语文逻辑相关,如

作者简介:李 开(1943 —),男,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古代常有“《尔雅》名义”之说。唐兰径直用现代逻辑回答“是什么”命题：“中国文字学是什么？”这已可见两家不同。^③潘氏已经注意到以古法论古义，斟酌古文名义以进行古书工具对象即文字的研究。潘著的阐述有：《周礼》“六艺”之一就是文字，“五曰六书”，足见文字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存在于上古“六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是汉儒的说法，不足为训；《大戴礼记》《尚书大传》《白虎通》都讲到古者八岁、十三岁或十五岁入小学，十五岁、十八岁或二十岁入大学，入小学后的科目，据《礼记内则》“教之数与方名”看，文字是必修科目；“文字”一词的出处，潘氏据《日知录》卷二十二“字”条指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台刻石辞“同书文字”为最早用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潘氏说，章炳麟主讲国学提出“文字学”最为明确；潘氏给出了文字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是文字，性质是科学，任务是说明文字的发生、发展和系统，内容是有关文字构造的法则和条理，目标是指出研究方法和途径。以上，文字居“六艺”的崇高地位、文字为古代小学科目、文字和文字学出处、定义五个观点等四题，起于古代演说文字和文字学名义，成于现代科学的学科定义，从名义到达定义，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学”的学术内涵、学科定位及相关研制方法。

关于“中国文字学范围”，潘氏首先明确了范围与名义、定义的逻辑关系。“认清”定义，方可“划清”范围，进而规定文字学的两大构成部门：中国文字的构造法则和条理，以及古今文字的研究和整理，包括对标准规范字和自由应用文字两大类的研究和整理，于后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民主和科学思想。作者说：“至于古代的甲骨、钟鼎……乃至现代的招牌、标语、传单、油印讲义上的种种文字”，“站在文字学的立场，都有搜集、整

理、研究的必要。”^{[1] (P6)}至于历史上有过的古代文字著作，潘氏以《隋书·经籍志》“小学类”的著录立说，从《三仓》《说文》一直讲到隋戴规《辨字》，共列出29种，可分标准文字研究、古文字学材料、俗文字学材料、应用文字研究四大类。潘氏认为，了解这些，有助于了解古代文字学的范围，是今人研究的起点。今人划定对象研究的范围、构建文字学理论、辨别文字正变体制、寻觅整理古代文字的途径，都少不了这些。撇开理论价值不谈，仅就29种而言，其中若干种是否为当代学者所知，恐怕也是问号。潘氏对《隋志》的高度重视，对历代文字学书目的推介，不能不说“于我心有戚戚焉”！

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特质”。讲起中国文字，潘先生笔端饱含深情：“它是自己民族全体的共同创作，它是自己民族全体的心灵结晶。”^{[1] (P7)}这和章、黄曾把汉字看作中华民族的“种性”是一脉相承的。直到1986年，潘氏还著有《中国文字与民族精神》，阐述汉字“种性”论，汉字民族“共同创作”论，民族“心灵结晶”论，并发展成为汉字“民族精神”论。潘氏阐述汉字两大特质，颇可引人注目。一是汉字“是形声双衍的注音字而不是拼音字”，一个方块字“可以代表一个声音，也可以代表一个事物”，既表音，又表义，是形字，也是音字，又因同音字特别多，所以既需耳治音，又需目治形。裘锡圭（1988）在研探汉字性质时，既列举种种，更考虑从“早期汉字”到“后期汉字”的发展，最后把汉字定位为“意符音符文字”，或称“意音文字”。^④潘氏“形声双衍注音字”说，深邃而通透，已进入现代文字学理论系统。潘氏还特别指出：“既然一个文字是一个音节，只需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统统写出来，又何必另外一套的拼音方式！”^{[1] (P8)}这既说明从古到今，我国原始的文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也可

说明从今以后,走西语文字拼音化道路是行不通的,汉字将永久存在下去。关于汉字的第二个特质,潘氏指出,汉字是“意符”,需“目治”,故能超时空,越地域。成就五千年文明,“全靠我们的文字”,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首功”,“只有我们目治的汉字,可以当之无愧”^{[1] (P9)}。又是笔端真情,正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言:“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道由情生”一直是儒家阐述的原理,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提倡“诗意的运思”,都是讲情感对哲思的意义,亦所谓“真情与真理同在”。读其书,想其人,可知潘先生是“才人加学人、真情加真知”式的学者。此外,汉字是“唯一具备高度艺术的文字”,书艺、骈文、律诗,唯使用汉字作记录工具的汉语所能。潘氏还说“中国文字学”不是 Philology (语文学、文献学),不是 Etymology (语源学),甚至也不是 Science of Language (语言学),而是 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这使人想起章炳麟 1906 年在日本接触类西方普通语言学以后,提出将传统的“小学”改为“语言文字之学”,标志着我国语言科学的诞生。后人读之,总觉得章氏当年要是改成“语言学”该有多好,今以潘氏“中国文字学”独立之论绳之,可加深对章氏之说的理解。独立之论不仅对中国文字研究,且对汉语史研究,乃至对整个古学的研究,意义都十分深远。后两者不都是以书面文字记录为依据的吗?潘氏文字学,从其作为师传家学的章黄之学一路走来,体验之深刻,感悟之醇厚,学路之正宗,功力之聚集,与不具备此条件学者相比,确有其优势所在。

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简史”。在叙事的历史源流方面,潘氏此题明显受到唐兰同名书《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字学史略”的影响,在叙事的学理逻辑方面,潘氏此题深受其业师黄侃《说文略说》的影响。潘氏之说作为文字

学理论构成,提出了中国文字学的三个时期和《说文》五大贡献。三个时期:周秦为中国文字学的开创时期,东汉许慎《说文》为确立时期,许慎之后为发展时期。发展时期则名目多样,丰富异常,从汉服虔《通俗文》一直讲到翟灏《通俗篇》。唐兰则以文字学“周朝开始”,许慎据古文经、六书系统写成“唯一的经典”立说,许慎之后经历了“小学最发展时期”,从仓雅学一直缕述到翟灏《通俗篇》和林义光《文源》。黄侃《说文略说》从纵向讲了文字的“初起”“制造先后”“六书起原”之后,随即横向展开讲述文字构造与变化的内在条例即内在逻辑,如说“变易孳乳二大例”“俗书滋多之故”“六书条例”“字体分类”“字书编制递变”“说文所依据”“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等十四目。以潘氏对黄侃学说的谙熟和敬畏之心,是不会不采用的。潘氏在言纵向“简史”时特转横向论《说文》的五大贡献——完成六书理论、确立标准字形、说明标准字义、保存正确解说、创立编排方法,正是黄侃《说文略说》纵向简述后突转横向论证的思致。而唐兰《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字学史略”恰恰未做横向论述,未言及《说文》的贡献。潘氏言文字学简史纵向“袭善”唐兰,而横向“袭善”黄侃。

在纵向叙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文献的引用。最闪光之点是潘氏注意到了《周礼·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扶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是说西周中央政府的治国之途,在语言文字方面,命令象胥(翻译官)、瞽史教授言语、辞令、文字(“书名”,书契文字)、声音,使国家的语言文字整齐划一,即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工作,可见,即使度量、数器、法则,也都离不开语言文字。据洪诚先生的研究,《周礼》“实起于周初,

历二百年之损益积累而成,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2](P206)}。这段话恐怕是说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起源的最早的文字,极有说服力。唐兰先生论“中国文字学史略”时未注意到此段文字。学界论语言文字学起源时,大都注意到《说文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六书”说,一是教,一是教造字之法“六书”,事见《周礼·地官·保氏》。但这段话主要讲什么是“六书”,是“六书”构造说,与《秋官》重在由国家制度说语言文字学的产生相异趣。当然,潘氏作《史略》,《地官》里的话也用了。《周礼》之《秋官》《地官》,《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北方曰译”,《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都加以引用,以证周代语言文字学器局。文献的引用方面,潘氏《史略》还大量引用纬书^{[1](P15-16)},这是昔日内地学者不可为之之举。

在横向叙述中,潘言《说文》贡献之一“完成六书理论”,不仅可说明篆书,而且“可以笼罩驾驭中国古今的文字”。可对接于黄侃《说文略说》“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黄侃详析徐铉校《说文》后附二十八字,以为不合“六书”的“俗书”,潘则说“一切俗字都不能超离六书的范围”,即使是今天的新造字,如“氢、氦、氮、氟、镭、铀”也不例外。潘说较黄说更具普遍性。潘言《说文》贡献之二“确立标准字形”,阐说《说文》“以篆文为主体,参用古文、奇字、籀文”,不用汉隶汉草之由,可对接黄侃《说文略说》“论说文所依据(下)”,称《说文》“以小篆为质,而益以古文,及奇字,及古文异体,及大篆异体,及篆书异体,及后所改定,及鼎彝之铭……汉以前古文已略具于此”。潘说“《说文》就是最早的标准古文字学”,甚至说“俗文字学研究,也当退本于许慎”^{[1](P18)},这正是潘氏敦煌文字研究的理论源头所在。不能不说,潘说视域较黄侃广袤。潘言《说文》贡献之三“阐明标

准字义”且多为“初义”,并说“一切引申后起的字义都从此出”,进而奉《说文》为“现代所称的字义学之祖”。比较黄侃《说文略说》“论孳乳变易二大例”,一可对接,因皆论及字义,二称深广,因涉及现代字义学由本义而引申义之普遍法则。潘言《说文》贡献之四“保存正确解说”,“字字有来历”,并以《说文》“旁”字言“阙”为例^{[1](P19)},张扬其求实的科学精神,可对接黄侃“论说文所据(下)”称《说文》“惟其所言者,皆有所依据”,“必有所宗,初无杜撰”。潘言《说文》贡献之五“创立编排方法”,亦可与黄侃“论字书编制递变二”相媲美。黄侃盛称《说文》分五百四十部“可以统帅天下古今字。此千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3](P18)}。潘则说许书是“文字学的全体,而非文字学的局部”^{[1](P20)}。至于黄侃取段玉裁之说,发明许书条例,言《说文》部首是“据形系联”,“列部之次第”,“以形近、义近为次第,列字之次第,大抵先名后事”,^⑤实际上是讲《说文》的语义逻辑顺序。对此颇有震撼力的新见,潘著涉及而未允^{[1](P182)},抑或更求平实、通达之旨。但根本原因,黄侃说来源于段氏,潘对段的批评很多,有的很严厉^{[1](P185,193)},不信从段氏“次第”说,几乎是情理中的事。事实上,段氏“次第”说产生之后,学界对此多有訾议的。潘著的选择慎思明辨,令人深思。

以上关于中国文字学的名义、范围、特质、简史,可谓文字学理论一般原论。作为原论,潘著、唐兰著都紧接着一般原理之后讲论构造法则“六书”。最值得注意的是,潘著在“六书”之后专论“中国文字构造法则”,并列出图表,上系先民心理形态,下结于中国语语型。^{[1](P87)}高屋建瓴,气象阔大,唐著“六书”“文字的构成”之后则无此内容。潘氏图表旨在探索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的关系,潘说:“语言是文字的灵魂,文字是语言的体魄。”^{[1](P86)}既探寻文字和语言的发生学层次

上的联结,又涉及先民的心理和社会。图表的内在逻辑构成是:先民生活心理形态及其反映→社会意识→民族思想→语言概念→单音语言→表象方式/符号图画→文字——个体造字法/关联造字法/(\个体法)六书\(\(关联法)转注假借←中国文字构造法则→中国语言类型。以上构成,把文字与心理、社会意识,文字与语言,文字构造法则与语言类型紧密联系,达到了现代文字科学、现代语言学科学的高度。

二、关于《说文》古文和古文字

甲骨文是1898年发现的,章、黄闻见之亦晚,但十分重视此新发现。此事由章、黄均推介、称引孙诒让《契文举例》《名原》可知,两著均是甲骨文字的研究。章氏称赞孙诒让“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遗》,其他有《名原》《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孙仲容疑《说文》𠂔字,杨(扬)许所说不谛”,以甲金文字说之为“𠂔”字。^⑥黄侃则径引《名原》:“邇年又有龟甲文出土,尤简渚(省)奇诡。”并主张由《说文》而研究之,^⑦这一点最值得注意,为潘氏终身力主从《说文》研究甲金文字之本。但章、黄本人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系统研究古文字。章、黄弟子潘重规以研究敦煌俗文字名家,但也提出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甲金文字的研究方法。唐兰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孙诒让《名原》偏旁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古文字研究四法:对照法(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⑧

作为对古文字的前认识,潘氏有三点引人注目。一是从书写工具来认识字体。潘以字体包括真、草、隶、篆,也包括欧、虞、颜、柳,将字体和书体合而观之。字体与书写工具纸、墨、笔、砚不可分,并据小屯第十三次发掘报告,征知殷墟已发现用朱墨书写的文字。1927年西北科考队又发现“汉居延笔”,说明木笔、

竹笔或毛笔用得很早。以上可统称为以文字书写工具文化说文字,辨之甚详^{[1](P90-104)},视野十分广阔。二是《说文》古文到底指什么?潘列出《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技”,即秦朝书“秦八体”和王莽新朝“新六书”,都可叫作古文,“从仓颉造字到夏商周流行的都统称古文”^{[1](P109)},后来有一个发展的节点,那就是传说周宣王时太史籀造大篆。从文字产生到大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研究它,一是载于经籍的古文,二是刻于甲骨的古文,三是铸于钟鼎彝器的古文^{[1](P110)}。第三是研究甲骨文也要以《说文》为起点。如前所说,这与黄侃的主张心心相印。潘说,“后来一切文字学上一切发现,一切工作”,都是《说文》的“延续”和“补充”^{[1](P20)},又说,《说文》“是采集经籍上的古文而成的”,虽然书内标明古文的不过五百来字,“其实许多未标明的也可能是古文”,《说文》是研究经籍古文的“最可靠的材料”^{[1](P112,113)}。在研究《说文》的专论中,潘说:“《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而益以古文及奇字大篆及其异体,实萃集仓颉造书以来迄于汉世教学文字之大成。”^{[1](P176)}又说《说文》:“不独在保存自古相传古籀篆书之字形,而亦在保存自古相传解说此字形之历史资料。”^⑨^{[1](P177)}在潘氏看来,《说文》所载古文和未载而实际上包含其中的经籍古文与龟甲古文为伯仲,故以研究经籍古文为研究龟甲古文之导入手段。潘氏将《说文》古文和未载入的古文与甲、金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是情有独钟,也是章、黄夙愿。

至于甲骨文,分甲骨文的定名、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研究鸟瞰、甲骨文字典、甲骨文特征五大块演说之,俨然甲骨学简史。既关学术,又关史事,至于发掘甲文时的坊间、村野故事,无不与闻,读之明学理,增见闻。甲骨文字的研究,潘引董作宾“四阶段”说:字句的考释、篇章的通读、分期的整理、分派

的叙述。潘说:“大概一般研究甲骨的学者,都很难超出他所说的范围了。”^{[1] (P121)}“四阶段”用以言学史,但也是研究法,与唐兰的“研究四法”比,董与潘“四阶段”研究法是全面研究之法,唐兰“四法”是释读之法。两者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潘曾附图片三幅,^⑩便于读者观览:商甲骨卜辞、骨匕刻辞(甲)、骨匕刻辞(乙)^{[1] (P145)}。举出二十二个甲骨文字以说“甲骨文字的特征”,应是“释读”一类的。潘氏指出甲骨文的特征为:笔势多方折、笔画多少不定、独体字向背不定、合体字左右不定、简笔字多(举了二十二个甲文简笔字)^{[1] (P123)}。由“释读”法而知总体特征,与形体分析和考证而“释读”是不相同的,颇可窥见潘氏研读甲骨文时的认知特点:一般抽象意识要多于、高于他对文字自身结构的认知。此外,由潘氏对总体特征的概括——“向背不定”“左右不定”,正可说甲骨文字制作法就是散点透视的。这一点,从其本原的结构性制作法决定了中国书法与中国画相同,都是散点透视的。今天,已释读甲骨文一千七百多字,在能释读的都已释读的语境下,董与潘的研究法是将甲骨学引向深入的途径。还有,很值得注意的是潘氏以自己的认知眼光发现了各家的优势,例如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内容分列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个细目,实开后来研究甲骨学的宏观”。至于“甲骨学四堂”,罗雪堂振玉“着重在文字的认识”,王观堂国维著《甲骨文中所见殷先公先文考》,用甲骨文材料“来考校古代的历史”,郭鼎堂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实际上也是由甲骨文字材料研考历史,董彦堂作宾著论殷历谱,甲骨文字断代,实际上也是做历史研究,谓之自然史、甲骨文自身的历史可也。很明显,潘氏的思致、倾向、推崇所在,“唯甲文以考史”而已,揭橥“四堂”与前述董与潘

“四阶段”研究法有共同的学理依据和学术定位。

三、关于文字学的应用

文字学理论和实践应用为文字学整体,科学性寓于其整体,而实践应用又可分为研究实践和操作实践。潘氏文字学研究型实践体现在他对《说文》的“约论”通说中、对《说文》借体之例的廓清中、考辨王国维“史籀篇非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研论中。操作实践主要体现在注释——潘著《论语今注》中。

研究型实践之一,著《说文约论》,中分三论。一论《说文》的特性乃根本不同于字书。重申《说文》两个“集大成”。一是“集汉以前文字之大成”,有赖于许氏创见:九千余字“每一字皆成为一独立体”,即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不管它是否见于典籍,而又溯每个字的“构造之根源”^{[1] (P175)},一竖、一点、一折、一撇等“终古不用之字而不可废也”。“汉以前文字”包括甲金文字,如潘氏著论文字学时所言,《说文》以其古文概涵之。二是“集汉以前文字说解之大成”,潘引黄侃收集的许慎引诸家说文录共39家125字^{[1] (P175)},并案其例而推广其说:“许君认清文字之独立性,不使用字之习惯性淆乱造字之独立性。”^{[1] (P176)}犹言不以语境、语用干扰语言文字本体结构之研究。二论《说文》形义解释皆有历史依据。“衣”字,《说文·衣部》:“依也。象覆二人之形。”^[4]清代学者从严可均、桂馥、王筠、朱骏声到罗振玉,无不攻许说有误,甚至说不是“覆二人”,而是“覆二臂”之误。潘氏从俞樾而发抒之云:古“凡附于体者皆通名曰衣”,故有头衣、胫衣、足衣、寝衣等,《说文》“依也”正合此说。“象覆二人之形”,说明是“上古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之时”的“寝衣”(被子)。御寒救死,“寝衣”最切。潘氏将《说文》“衣”字并甲骨、金文“衣”字比照呈现,“造字者从

其朔,故象夜寝覆体之衣”^{[1] (P181)}。潘说能否廓清清儒之说,学界可予置评,但“依也”之说是确凿无疑的。三论治《说文》的方法,实践性更明显。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本性。针对学界“说多缴绕,增人迷惘”,提出“玩索本文,通其条理,本文畅通”之“三法”实为一法,即“通其条理”。强调贯通《说文》条理,即寻觅其内在逻辑,是章、黄一贯主张,今由潘氏光大并申论之。潘氏提出《说文》义例、字例、句读例、当求文字音义贯通例“四例”。“四例”为《说文》本体条理,如“义例”说许书重本义^{[1] (P183)}，“字例”说许书重本义之字^{[1] (P184)}，“句读例”说许书注释例,如潘著此书内的“连篆读”^{[1] (P185)}。最后提出由治《说文》之法而及研治古文文字器物,力戒“妄破《说文》,拨其本实,则堂构未成,基础先毁”。^{[1] (P192)}今天面对大量的出土文物,从郭店简到沪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及仍在争议中的浙大简,章、黄学派传人潘氏之戒,远非过时,且在研治方法上,潘氏的“三法”“四例”也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研究型实践之二,著《说文借体说》。《说文》借体本身是造字之法的一部分,“借他字之体以象事物之形”。^{[1] (P193)}徐锴提出并加诠释未允,清儒少有达于此旨,连段玉裁也未搞清楚。^①潘氏的解释是清晰的。如:王(丨其贯也)、中(丨上下通)、中(丨象出形)、十(一为东西,丨为南北)、丰(丨象声气上出)、京(丨象声气上出)、巾(丨象系形),以上七字均借丨。又如:番(田象其掌),此字借田;为(爪象形也),此字借爪。汉字造字之借体,很像西语中的借外语词中的某一发音、形态、语义,而非整个儿借某词,因而隐匿不显,极难

察见,需熟谙本族语和外族语的学者“细心淘出”^[3]。潘氏拨开重重迷雾,从《说文》中“细心淘出”“借体”,是对《说文》学的重要贡献,对释读古文字无疑也是有重要作用的。潘氏归纳许书借体术语七例,借体之例五例,^{[1] (P203)}可资释读者在古文字形体构造元素层面上作比照之用。

研究型实践之三,著《〈史籀篇〉非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辨》。是篇针对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而作,王说“史籀篇非……”,但主要之点尚不在此,而在于王说构成“史篇文字→秦文字/周秦间文字/西土文字/东土文字/《说文》古文等”新系统,与传统的“古文→籀文→篆文”系统不同。潘以王说“违远事实”,不得不辨。潘氏之辨实际上也是推广章炳麟说。章氏《小学略说》以孔壁中书为古文,周代钟鼎亦古文多而籀文少,“史籀成书,仅行关中,未曾推行关外”^{[1] (P224)},潘又从《说文》“知篆籀古文本同源共体”,^{[1] (P230)}按章说,根本不能形成西土文字格局,不能形成东土文字别于西土文字之说。潘认为“章氏之言,可谓深得当时情实”。^{[1] (P230)}文字传承,只能是《说文》彰显的“古文→籀文→篆文”传统脉络。潘氏此辨,一宗章、黄,更循《说文》。但平心而论,潘氏之辨能否完全推到王说,尚需继续研究,不过潘氏此说在海外有较大影响,不少人是接受潘说而扬弃王说的。潘氏之辨的功劳在于维护了《说文》文字传承脉络,否定了王说《说文》只传东土古文、不传西土文字之说,而按章、潘之说,周秦间文字无西土、东土之别,《说文》均传承之。尤可注意的是,潘氏“篆籀古文本同源共体”说实际上已成为学界研究小篆文字的共识。

注 释:

① 潘读大学期间,业师黄侃曾携潘去上海为章炳麟祝寿,章氏见之,期许其如唐代李百药。百药字重规,

唐太宗时官太子右庶子、左庶子,是研究南北朝史的史学家,撰《齐史》。遂将潘原名崇奎改为重规。

由沪返宁后,黄侃为之易字“袭善”,并用铁线篆大书“重规袭善”予之,以示宠异。参见祖保泉《潘重规年表》,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亦可见潘重规《母校师恩》,载张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李百药,《隋书》42卷、《北史》72卷、《旧唐书》72卷、《新唐书》102卷均有传。

- ② 这35种是:《训诂述略》(1935)、《声母多音论》(1937)、《评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1937)、《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小笺》(1943)、《新训诂之一》(1952)、《新训诂之二》(1952)、《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1954)、《论罗家伦所提倡之简体字》(1954)、《“罗家伦氏推行简体字运动”在审查会发表之意见》(1955)、《〈史籀篇〉非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辨》(1960)、《训诂与翻译》(1961)、《从中国文字看中国民族特性》(1961)、《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1962)、《中国文字整理途径与教学方法之商榷》(1962)、《集韵声类表述例》(1964)、《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1969)、《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卷子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1970)、《瀛涯敦煌韵辑别录》(1973)、《瀛涯敦煌韵辑新编》(1974)、《中国文字学》(1977)、《韵学粹金》(1977)、《训诂漫谈》(1978)、《中国声韵学》(合著1978)、《敦煌俗字谱》(1978)、《中国文字与民族精神为根柢辨》(1979)、《龙龕手鑑新编》(1980)、《文字学论著初集》(1980)、《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1980)、《经典释文韵编》(1983)、《玉篇索引》(1983)、《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1983)、《龙龕手鑑与写本刻本之关系》(1983)、《龙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1983、1984)、《中国文字与民族精神》(1986)、《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整理与发展》(1991)。此外,还有《书序评论》、《字词考释》等文章近百篇。

- ③ 如将潘著《中国文字学》(1977年2月初版,1983年9月再版)与奉为文字学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的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第1版,1979年9月原纸型重印)相比,两书的构成、要目大体相同。可见一斑。又:潘在著论《中国文字学》时,曾以唐著为参考书,见潘著第10页可知。

- ④ 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第16页。

- ⑤ 段说见《说文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19页下栏左。黄侃说见《黄侃论学杂著》第

18页。

- ⑥ 参见章炳麟《孙诒让传》、《三与黄侃书》(1908)、《与孙仲容先生书》,载《太炎文录初编》卷二,《民国丛书》第三编83号,上海书店影印版。
- ⑦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25页。
- ⑧ 唐兰《古文字研究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1月出版,第130页、164-193页。
- ⑨ 潘重规阐述《说文》深含经籍上的古文一说,实是研核另一种新发现的古文即甲文字也需从《说文》入手的导入,潘著引王国维考定的汉代发现的十种书籍和十五个本子,大都只存壁中书(111页),又引钱大昕《跋汗简》“《说文》所收九千余字,古文居其大半”说(112页),引段玉裁《说文注》称《说文》“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113页)。特别是详引章炳麟《小学略说》论及石经文字和伪古文《尚书》的关系的那一段话,“汉时通用载籍,沿用隶书……而多存古字,亦足宝矣”(116页),可看作潘氏重视《说文》古文说乃发扬章说之证;其中章氏特别提到“宋薛季宣《〈尚〉书古文训》,字形瑰怪,大体与石经相应,敦煌石室所出《经典释文》残卷,亦与相应,郭忠恕《汗简》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尚书》”(116页),意即敦煌残卷与薛、郭二家同,多经籍古文之证,此为潘氏遵师训而心仪敦煌之初始欤?
- ⑩ 潘著共附图片96幅,其中有“唐人写《说文解字》木部”、“日本古写本《说文解字》口部”、“宋版《说文解字》”、“清藤花榭《说文解字》”四种,有极重要的读图信息。另有“战国毛笔、竹管笔,长沙左家公山出土”亦然。又96幅图片或多有摄自潘氏家藏实物,未可知也。
- ⑪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已注意用借体来分析汉字间的音义联系,但未明确提出“借体”术语。《说文》“矢”字小篆形体:“从人,象镞(箭头)栝(箭尾)羽之形。”徐锴《系传》仅指出“象栝羽”部分,即带有羽毛的箭尾(见中华书局《说文解字系传》100页下栏)。而段注也未提出“借体”术语,许书“从人”段注云“矢欲其中”,实际上许书说的仅仅是箭头的形状,这从甲骨文看得更清楚,“从人”之说不是“进入”字,而是近于“人”字形(实际非“人”字)的箭头;许书“象镞栝羽之形”段注云:“镞谓|也。”实际上段只讲了箭身形,还不是箭头(镞)部分。(上海古籍版《说文段注》226页上栏)故潘重规批评徐锴“明而未融”,批判段“未瞭斯义”(潘著《中

国文字学》193页)。桂馥已明确提出借体概念并运用之。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九《韩勅造孔庙礼器碑》引桂馥跋文云:“粗即俎字,皆借体也。”清杨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二《汉熹平二年玄儒先生姜寿碑》:“且之为沮,椎之为確,此皆汉碑之借体。”借体属于形体假借,现代学者多将其移入假借、通假等说之,笔画构件层面上的“借体”则列入文字形体统

论之,未见另提“借体”专论,与“借形”说亦无共同之处。学界以现代的“三书”取代传统的“六书”,陈梦家提出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提出表意、假借、形声(参见《中国文字学》107页),而整体或构件之借体之法不啻是假借,恐怕在“三书”中都有反映。

参考文献:

- [1] 潘重规. 中国文字学 [M]. 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3.
- [2] 洪诚. 洪诚文集·雒诵庐论文集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3]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 [汉]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5] 潘重规. 论语今注 [M]. 台北: 里仁书局, 2000.